

朝向公共信息文化共同体的公共图书馆发展观重构 ——基于“公共图书馆免费开放”的超文本思考

张欣毅

摘要 以文化部、财政部《关于推进全国美术馆、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站)免费开放工作的意见》的公布与实施为契机,提出构建现阶段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的理论体系,即“朝向公共信息文化共同体的公共图书馆发展观”和“新公共图书馆学”。站在民族文化振兴战略、西部社会信息化战略的高度,指出当前最突出的问题是解决好免费开放与公共图书馆事业转变发展方式、服务体系的制度设计、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改革创新这三大发展战略目标的衔接、整合。参考文献 16。

关键词 公共图书馆 免费开放 发展观重构 公共信息文化共同体

分类号 G258.2

ABSTRACT The Ministry of Culture and the Ministry of Finance of China have issued recently “Opinions on Promoting Free Access to Museums of Fine Arts, Public Libraries and Cultural Centers (stations) in China”. For public libraries to adapt to the new situation brought about by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Opinions, the author proposes the construction of a theoretical system for public libraries’ development at the present stage, which includes the “Cultural Community of Public Information Oriented Development Concept of Public Libraries” and the “New Librarianship for Public Libraries”. In view of the strategy of revitalizing Chinese culture and of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strategy for the Western China, the author points out that the most prominent issue to deal with is to link or integrate the free access policy with the three general strategic goals of public libraries-Change of Development Mode, System Design of Services, and Reform and Innovation of the Management System and the Operation Mechanism. 16 refs.

KEY WORDS Public library. Free access. Reconstruction of development concept. Cultural community of public information.

CLASS NUMBER G258.2

2011年新春伊始,文化部、财政部《关于推进全国美术馆、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站)免费开放工作的意见》^[1](以下简称《意见》)新鲜出炉,付诸实施。出于一个长期从事西部省级公共图书馆专业管理人员的本职本份及其积习使然,自然首先习惯性地将《意见》(含相关官方文件、领导讲话)视为一种现阶段我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加速发展的“政策文本”,将“推进公共图书馆免费开放”作为一种实践可操作意义层面的“工作对象文本”来研读、思考。与此同时,出于一个学者型管理人员、专业刊物主编者的职业习惯,笔者更偏好于去捕捉、解读、领会蕴藉于这两类“文本”更深层面或言“形而上”的“超文本”信息。本文所述即是笔者之于“公共图书馆

免费开放”(《意见》及实施)的“超文本思考”的主干部分,它以“朝向公共信息文化共同体的公共图书馆发展观重构”为基本向度。

笔者个人体会,这种“超文本思考”不仅有助于人们更好地领会、把握“公共图书馆免费开放”自身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或更有助于升华对我们所从事的这个职业、事业的核心价值、发展观的理论自觉、文化自觉。

如果站在“图书馆职业人”和“图书馆学人”两栖的立场去打量、梳理世纪之交以降我国图书馆事业(尤其是公共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以及与之互为表里的图书馆学的进步,笔者以为有

两条主线是极其突出且极具革命性意义的。一条是围绕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图书馆、图书馆工作、图书馆事业的核心价值的理论审视与探究,业界称之为“人文本体论(社会价值本体论)转移”;一条是基于科学发展观“内化式的”解读与践行的图书馆事业(尤其是公共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战略研究与实践探索、创新,业界称之为“发展观重构”。

“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认识事物,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便认识到什么程度。”^[2]如果说,世纪之交以降短短的十余年间关于图书馆事业尤其是公共图书馆事业的“人文本体论(社会价值本体论)转移”、“发展观重构”能够取得令人瞩目的长足进步,无疑是当代国际国内社会发展价值观转移(重构)孕育出来的诸多发展主题复合拉动的结果^[3]。这里,笔者无意去对迄今仍在进行中的业界本体论转移和发展观重构的学理层面的问题说三道四,那不是本文的任务和主旨所在。笔者之所以开宗明义即将基于“公共图书馆免费开放”的超文本思考锁定在“朝向公共信息文化共同体的公共图书馆发展观重构”这一基本向度里,乃是因为我们已然深切地意识到在这个“基本向度”里,有着一个以“公共”(包括“共同”)为价值观共轭中枢张布着的“超文本”认知的意义空间。

所谓“公共信息文化共同体”,原本是对业界正在探讨中的“公共信息资源及其认知机制”(PIR&CM)社会价值本体论(人文本体论)范畴概念的一种“理一分殊”式表述。什么是“公共信息资源及其认知机制”,我们曾给出过这样一个基本定义:“在对一定时空意义的公共的基本文化利益、文化权利、文化义务认定基础上,旨在提供公共文本利用(认知)的社会信息资源集合及其相关社会机制。”^[4]如果运用现代结构分析理论,公共信息资源及其认知机制的结构性要素可以抽象为公共及其认知、(狭义)公共信息资源、(广狭义)认知机制三大范畴。而依据社会价值工程理论,“公共及其认知”因为更多地体现着具有核心价值意义的“主体间关系定位”,因而可以用“公共信息文化共同体”加以范

畴性指代,但这只是其相对次要的能指意义。

我们的研究认为,可以把“公共信息文化共同体”视为人类社会发展到较高文明阶段后必然要形成的一种公共信息文化存在形态、生存方式,它以“公共信息资源及其认知机制”为社会本体论,以(抽象意义、整体意义、现实意义、个体意义的)“公共”对“公共信息资源及其认知机制”的共建、共识、共享、共用为社会价值中枢^[5]。

如是居间,以“公共的”名义标榜的公共图书馆是一个什么角色呢?我们将之界定为“公共信息资源”及其“认知机制”的全职性社会组织机制(机构)^[6]。它是推动“公共信息资源及其认知机制”不断朝向“公共信息文化共同体”这一“社会价值工程”进化、进步的一种社会力量,一种公共制度安排。当把“公共图书馆”内化进公共信息资源及其认知机制的“主体间关系定位”,它与政府(公共权力的代言人)合构成位于“享用者”、“知识产权人”之后的第三主体,共同承担“经纪人”的中介角色。在第三主体内部,二者之间则存在着委托、授权、主办与受托、被授权、承办的关系。

如上所述,对于长期桎梏于“图书馆学”这一“机构范式”思维场内的业界学人来说,可能多少有些解读上的困惑。为了收直奔主题之效,我们不妨以与这次“公共图书馆免费开放”有深层内在关联的“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简称“共享工程”)为某种实证参照。在我们看来,如果将“共享工程”的核心架构与“公共信息资源及其认知机制”作一类似,“文化信息资源”当与“公共信息资源”语义等价,“共享工程”当与“认知机制”语义等价,“共享”当与“公共及其认知”语义等价。而更重要的是:这项由各级政府主导、各级公共财政强力支持的“公共信息资源”免费共享的浩大文化(信息)惠民“工程”是由各级公共图书馆承担事业主体职能的^[7]。

笔者有幸参与了“共享工程”宁夏(农村)全覆盖试点项目及其与新建宁夏图书馆尤其是内含其中的“数字图书馆”工程整合项目论证、设计、实施的全过程^[7]。将如是居间领悟到的理

论启示反哺于对“公共信息资源及其认知机制”的进一步研究，遂升华出对“公共信息文化共同体”这一更具价值认知“张力”的范畴概念的新认知^[8]。当然，就构建“公共信息文化共同体”这一范畴性概念本身而言，国外学者将信息资源管理(IRM)视为“图书情报领域早已熟悉的挑战的更为复杂的变体”^[8]、“情报意味着共享一个共同世界的可能性”^[8]等思想、观点也不无启迪作用。

“公共信息资源及其认知机制”、“公共信息文化共同体”，包括时下业界热议中的“公共信息共享空间”^[9]、“公共知识空间”^[10]之类，其实都是我们对我们所从事的这个职业、事业的社会价值本体论或曰核心价值观重构的某种“自我理解”(本体论自觉)。如果将之转换进时下政府的话语体系，与之相对应的应是“政府主导下的社会共建共享的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而一旦进入这种转换后的“语境”里，则不啻又打开了一个新的“超文本”认知空间。这里举一个实例，那就是此次将美术馆、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站)(包括此前的博物馆)放在“免费开放”的同一观念平台上，其在“公共文化、公益事业”这个大范畴的能指意义上又实质性地极大拓展了前述那个“公共信息资源及其认知机制”、“公共信息文化共同体”的社会维度上的“疆界”。如何将之于“共享工程”所链接的那个基于“数字化公共信息资源”的(实体与概念)体系进行整合，则又是一个“超文本”认知空间。

二

或有人言，我们何以非要在多个(甚至N个)“话语体系”中跳来跳去、转来换去呢？我们直接使用政府的话语体系难道不行吗？笔者的回答是：对于业界的普通从业人员、行政管理者来说，至少在现阶段尚无须“非要”、可以“行”。充其量领一顶“政治说教”、“图解政治”之类的帽子而已。而对于广大的图书馆专业工作者、研究人员，尤其是所谓“学者型”管理人员(包括管理图书馆的上级业务行政领导)，这就“非要”“不行”了。须知，任何社会、任何时代的政府

(官方)话语体系都是偏于“政治”的。至少在本文的“语境”里，如果不能将之内化式整合进或言转换成某种“学科”、“专业”话语体系，并借这种整合、转换形成更具专业性认知价值的“自我理解”、“理性自觉”，那么，非但不能提升实践方面的“主观能动性”，更殊难在“新时期新阶段”横亘于业界发展之中观“瓶颈”若“体制机制改革创新”、“转变发展方式”之类的破解上有所作为。当然，这还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我们曾奉为圭臬的用以充当事业、职业理论规范的那个传统的“图书馆学”其实原本就不具备这种“超文本”的理性认知能力。借用业内学者黄俊贵先生的“话语”，传统图书馆学充其量只是一个“机构范式”，或言“图书馆管理学”，它在研究对象的本体论尤其是人文本体论(社会价值本体论)建构的“先天缺失”，使其只能解释、回答一些属于“形而下之器”层面的问题，遇到像“人文本体论转移”、“社会价值观重构”、“发展观重构”之类的“形而上之道”层面的问题就显得太过苍白无力了。这种情形何止一个“丑陋的图书馆学”可以了得。退而言之，传统图书馆学即使仅仅作为一种管理学理论体系，在其旧有的体系架构上也有太多的“先天不足”而显得“丑陋不堪”。这里，应对来自“信息资源管理”论域的新挑战之能量不足姑且不论，它甚至不能给我们在“制度设计”、“保障机制(尤其是公共财政保障机制)建设”等紧迫的重大现实问题的解决上以切实的理论指导与智力支持。不过，这里要特别强调，如上两种情形的“丑陋”，其责不能归咎于业内学术界，甚至不能归罪于传统图书馆学本身。这就又应到了前引马克思的观点上了。简言之，时代使然，时势使然。

说到这里，有一个基于“时代”、“时势”的逻辑判断应该是成立的，那就是在综合吸纳当代多种学科(特别是信息资源管理、公共管理学、公共经济学、公共财政学、信息哲学、科学哲学、公共文化学、大众传播学、认知科学、社会信息化理论、阅读学等)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形成图书馆事业尤其是公共图书馆事业的“人文本体论(社会价值本体论)”元理论架构是当代业

界“科学革命”绕不过去的一个“坎”。舍此，我们难以形成如科学哲学大师库恩所谓的具有理论与实践双重整合价值且能统摄各种维向度及层面的“元理论”之“必要张力”，进而也难以以为图书馆事业尤其是公共图书馆事业向网络化、信息化时代和“公共权力时代”的公共信息文化服务业的实质性转变提供切实有效的理论指导与智力支持。笔者之所以更倾向于使用“公共信息资源及其认知机制”、“公共信息文化共同体”这样的大范畴概念，更多地考虑了其作为范畴概念的“必要张力”（超文本能指力），但它不意味着排斥诸如“公共信息资源管理”、“公共信息文化共享空间”、“人民的网络”、“全体人民的共有精神家园”之类的或然判断与选择尤其是“理一分殊”式建构。同时，笔者也对业界构建“新公共图书馆学”的研究取向持肯定态度。但笔者以为，这个所谓“新公共图书馆学”绝然不应是传统意义上的那个“图书馆学”的分支学科（下位类学科），而应是一个以“公共信息资源及其认知机制”、“公共信息文化共同体”之类为本体论依托的顶级学科范式。它应以“公共（的）”为核心概念、元范畴，并以“共建、共享、共知、共识、共同（的）、共有”等为“分有是”范畴或言“理一分殊”式建构。更重要的是，它当具有对其它类型图书馆事业朝向公共化的未来趋势的“必要张力”。同时，笔者也主张将“超文本”作为“公共信息资源及其认知机制”、“公共信息文化共同体”、“新公共图书馆学”研究方面的基本方法论。考虑到这一问题对于阅读本文的特殊重要性，建议在阅读本文的同时参阅一下笔者的相关论述与观点^[11]。

再扣回到本文的主题——朝向公共信息文化共同体的公共图书馆发展观重构，我们欣喜地看到，伴随着公共图书馆事业在文化“两大一新”、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构建、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保障广大公民信息权益文化权益、构建学习型社会、全民阅读、“终身教育”、文化民生与文化福祉、先进文化与和谐文化建设、消除数字鸿沟、提升国民素质、促进和谐社会建设、提升国家软实力等一系列我们这个时代崇高而艰巨的发展主题中的地位、作用、价值的不

断提升，由图书馆（尤其是公共图书馆）实践领域的先知先觉者们、业内学术界当然也包括行业主管部门的“公共知识分子”精英们共同开启的“朝向公共信息文化共同体”的理论自觉、文化自觉已然破冰而出，风生水起。从“十一五”、“十二五”的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到两部关于公共图书馆的部颁标准及12部以“公共图书馆”冠名的地方法规的陆续出台^[12]；从新编《图书馆学概论》对图书馆人文本体论充满哲思价值的“补足”^[13]、业内学术界一大批“公共知识分子”们对基于“公共信息文化共同体”的“新公共图书馆学”的执著而富有建设性的学术探讨到中国图书馆学会的《图书馆服务宣言》和著名的“株州共识”、“常州共识”、“嘉兴共识”^[12]以及深圳图书馆新办刊物直接以《公共图书馆》命名；从“共享工程”进入可持续发展阶段到“公共图书馆免费开放”作为一项重大文化民生工程启动……如是居间还有对国际图联《公共图书馆宣言》、《公共图书馆服务指南》等的“国际视野”的解读与意义整合。凡此种种，都在更高层次的“超文本”意义上预示着一个“新公共图书馆学”理论自觉、文化自觉的新时代已经或正在向我们走来。

笔者注意到，在国家两部门关于“三馆一站”免费开放的《意见》中，从标题到正文，赫赫然只有“图书馆”前面始终冠有“公共”二字。这是耐人寻味的。人们当然可以把它理解成为了便于与“高校”、“科研”等其它类型图书馆相区别，抑或为了有别于时下已存在着的“民营图书馆”。但笔者体会它或当另有“超文本”的深意。其一，在国家层面政府文件中郑重使用“公共图书馆”这一语义性范畴概念而非省、市、县图书馆这样的行政级别式称谓，其实只是自2003年国务院颁布《公共文化体育设施条例》以来才有的事情，且多在带有法规性质的文本中使用，如国务院颁布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文化部等部颁《公共图书馆建设用地指标》、《公共图书馆建设标准》。这显然体现着与将进入全国人大“十二五”立法程序的《公共图书馆法》在概念术语上追求一致性的某种自觉。其二，在本文命题的意义上，这其实也是另一种向度的“话语体

系转换”，更何况在《意见》之为“准法规”这样的层面上。其三，将上述两个方面与此次以“推进公共图书馆免费开放是政府主导的重大文化民生工程”为主题的宣传力度之“空前”等相联系，也会使业界人士很容易联想到英美等国在19世纪以《公共图书馆法》立法及实施形成全民性的“公共图书馆运动”的情形。

凡此，如果再转换进“公共信息资源及其认知机制”、“公共信息文化共同体”之类的“话语体系”，是否也同时意味着一个政府层面尤其是全社会层面对“公共图书馆”的核心价值观解构与重构的共知共识的崭新时代已经来临。

回答当然是肯定的。我们的相关研究认为，人们固然在宏观上可以把公共信息资源及其认知机制理解成“公共”、“知识产权人”、政府、图书馆等组织四大主体间的权利义务互动体，但在本质上，公共信息资源及其认知机制则是围绕“公共”对“公共信息资源”及其相关“认知机制”的共建与共享的社会契约式建构。由是，“公共”对公共信息资源及其认知机制的认知便在本体论意义上表征着“公共”的主观能动性。进而，这种主观能动性又形成了驱动公共信息资源及其认知机制朝向“公共信息文化共同体”社会性进化、发展的最经常、最具革命性的现实力量。诚如西方文本阐释学大师姚斯所深刻指出的那样：“大众(公共)并不是被动的部分，并不仅仅只是作为一种反应，相反，它本身就是历史的一个能动的构成。”^[14]与之异曲同工，文化部部长蔡武在最近发表的关于“‘三馆一站’免费开放”的一篇政论文章^[15]中则以“五个即服务”的新理念向世人传达着对“公共图书馆”等文化设施核心价值观重构、发展观重构的新认知，读来颇感言简意赅、情真意切。

三

《易》云：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借以类比式分析“朝向公共信息文化共同体的公共图书馆发展观重构”这一时代命题，个中，“公共信息文化共同

体”当属“形而上之道”，“公共图书馆发展观重构”当属“形而下之器”及其“变”、“通”、“举措”。如果再将这种类比转换成“发展观”的“话语体系”，那么，“公共信息文化共同体”就是“公共图书馆发展”的方向目标，所谓道的建构。“发展观重构”云云，当然是“形”、“器”层面的问题。前者，侧重“道”的梳理(目标定位、定向)，突出回答“为谁发展”、“靠谁发展”的问题；后者侧重过程、方式、路径，突出解决“怎样发展”的问题。

事实上，自打这个世界上有“公共图书馆”那时起，所谓“发展观重构”就可以说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命题，那是因为公共图书馆的社会价值观、人文本体论的转换、重构本身就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命题的缘故。在国际范围，这一点只要大致看一看从阮冈纳赞的“图书馆学五定律”到所谓“图书馆学新五律”、从欧美早期《公共图书馆法》到本世纪初国际图联的《公共图书馆宣言》的显著而深刻的演变就可了然了。在当代中国，这类研究与实践探索之所以长期被压抑在可称之为“滥觞”、“萌芽”的状态，传统图书馆学自身方面的诸多缺陷所囿其实只是一个方面的原因，而且应该不是主要的原因。更主要的原因恐怕还是我们所从事的这个职业、事业在社会现实层面上长期处于“弱势”甚至“超弱势”。不能想象，一个弱势的行业、事业，能建起强势的理论大厦；同理，很难想象一个弱势甚至超弱势的“理论”能在一个事业、行业迅速崛起、转型中起到什么有价值的作用。

世纪之交以降，尤其是以2003年“非典”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紧急处置后国家层面一系列“公共政策”的重大调整为“时间窗”(或曰“时间拐点”)，“朝向公共信息文化共同体的公共图书馆发展观重构”破茧而出并渐成气候，势必有其在发展规律方面的客观必然性，自然也包括业界同仁理论自觉、文化自觉的主观成因。而这种理论自觉、文化自觉尤其突出地体现在对科学发展观之为社会发展价值观转型与重构的“纲领”内化式整合的自觉。

以科学发展观来解读当代中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在“十五”、“十一五”尤其是已经进入的

“十二五”时期的发展战略、发展取向、发展路径，笔者体会，在战略全局上可以梳理出三大主线：一是构建由政府主导的、覆盖全社会的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保障和满足全社会成员的公共信息文化权益与需求，让改革开放带来的公共信息资源建设成果、公共文化发展成果全民共享。突出解决“为谁发展”的战略取向问题。二是不断深化围绕公共化、公益性、文化民生保障、社会信息化等社会价值本体论形成与彰显的体制机制改革。突出解决“靠谁发展”的主体定位与社会职能履行问题（或曰“发展动力”问题）。三是全面实施带有全局拉动、服务资源全方位优化整合意义的“项目、品牌”带动战略。突出解决“公共经济学”、“公共文化学”视域内的“发展路径”问题。将之迁衍到广大西部地区，还有一个与两轮西部大开发战略、两轮文化体制改革以及西部文化尤其是民族文化振兴战略、西部社会信息化战略的深度整合、广度匹配问题。因此，在更高的层面上，西部公共图书馆事业的科学发展亦可以概括为“跨越式发展”（包括“又好又快”发展以及符合发展规律的超常规发展）。

如果接续“时间窗”的概念能指意义，那么，2011年早春时节“当春乃发生”的这场以“推进公共图书馆免费开放”为主题的“新公共图书馆运动”，当然也是一个更具有“超文本”能指意义的“时间窗”“拐点”。它的能指意义包括但不限于本文前面分析过的两种向度的理性自觉、文化自觉，更包括在“发展观重构”这个层面的同样具有丰富内涵的理性自觉、文化自觉，尤其是实践创新自觉。

在此次国家两部门关于“推进‘三馆一站’免费开放”的《意见》中，明确提出了“使免费服务成为政府的重要民生项目和公共文化服务品牌”的全新概念以及“三着眼”（着眼于保障公民基本文化权益，促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着眼于发挥公共文化机构的基本职能；着眼于增强公共文化服务能力与管理水平），“一重点”（以健全和增强服务项目、服务能力为重点），“一推进”（进一步推进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改革），“一结合”（与建立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经费

保障机制相结合）的指导思想。将之与前述我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在“十一五”尤其是“十二五”时期战略全局上的三大主线相联系，其张布着的“发展观重构”方面的可持续创新空间不可谓不阔大。

这里，有一个颇具“超文本”认知价值的问题值得特别关注。那就是就“公共图书馆免费开放”自身的能指意义而言，无论把它单独置于当前我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战略全局三大主线的哪一条“线”上，其自身的“结构要素”尤其是“功能性结构要素”的量级都可能不是最大的，但若将这三条主线置放于一个或观念或实践或路径或可操作的统一“平台”上，其公共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正外部性”价值^[16]就凸显出来了，何况它还直接与国家层面的“文化民生”的社会价值取向转移，与整个社会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改革、发展大方向有更深层次的关联。换言之，公共图书馆“免费开放”既然是由政府主导的重大“文化民生项目”、“文化惠民工程”、“公共文化服务品牌”，就必然有“放大正外部效应”的内在要求和与其它正在实施中的重大发展战略协调、统筹、整合创新的“系统化”思维、实践与路径设计。当前，最突出的是要切实解决好与公共图书馆事业转变发展方式、服务体系的制度设计、管理体制运行机制改革创新三大发展战略目标任务的有效衔接、整合的问题。进一步说，当前不但要抓住《意见》实施的大好时机，扎实推进公共图书馆“免费开放”（工程）主体目标任务的落实、完成，同时还要抢抓“免费开放”带来的重大发展“机遇”，将“免费开放”适时适度地内化为转变发展方式、服务体系制度设计创新、体制机制改革创新的重要抓手、结构要素、“运作平台”。特别是后一点对西部公共图书馆事业尤其重要，它一方面体现了在西部特殊、特定的发展环境、条件下对“免费开放”之“正外部效应”的有效放大，另一方面也是西部公共图书馆事业“跨越式发展”的不二选择。

不论是东部沿海地区、东北部与中部地区还是更广大的西部地区的公共图书馆事业，经过“十五”、“十一五”的十年拼搏，现在和全国各

各行各业一样,都面临着一个“转变发展方式”的共同命题。而西部由于自身条件的限制,还多了一层规模、布局、数量方面的“短板”效应。与之相关联,文化体制改革、内部运行机制改革创新在地区间、地区内也显得极不平衡。而从发展战略的宏观结构上讲,“服务体系的制度设计”作为“转变发展方式”与“体制机制改革创新”的中间论域,是在“十一五”末才浮出水面并被写入“十二五”规划的。在总体上,西部公共图书馆事业在这三大方面的理论探讨和实践创新空间应该说都要相对阔大一些。因为,所谓“跨越式”发展更追求和讲究后来居上、后发优势。位处西部的宁夏图书馆、陕西图书馆、四川图书馆、重庆图书馆等在这几年的“跨越式”发展已经并正在证明着这一点。

转变发展方式、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服务体系的制度设计都是大题目、大文章,本文殊难展开讨论。就是“免费开放”如何与之紧密结合的论题也只能作为引玉之砖先抛开来,有待于进一步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创新。但不管怎样说,“朝向公共信息文化共同体的公共图书馆发展观重构”作为一个理论与实践“知行合一”式命题、主题,已经告别了那个只能靠移植几个其它学科的概念、术语加上几个应景性、应时性政治概念拼凑出所谓“××学”的可怕时代、浅薄时代、“迷失了自我”的时代,步入了一个以强势思维应对强势发展、以超文本思维应对超文本式的对象演化,以“自我理解”、“自我批判”基础上的理性自觉、文化自觉应对朝向“公共信息文化共同体”的历史性跨越发展的全新时代。

如是,或当亦为本文所谓“超文本思考”的“超文本”。

参考文献:

- [1] 文化部,财政部.文化部、财政部关于推进全国美术馆、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站)免费开放工作的意见(文财物发[2011]5号),2011-01-26.
- [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62.
- [3] 张欣毅.多重时代主题复合拉动下的公共图书馆发展观重构——兼及宁夏图书馆新馆实践

创新的理论梳理[J].当代图书馆,2010(4):4-7.

- [4] 张欣毅.超文本范式——关于公共信息资源及其认知机制的哲学思考[J].中国图书馆学报,2003(3):14-19.
- [5] 张欣毅.PIR&CM作为一种公共信息文化共同体[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10(1):1-5.
- [6] 张欣毅,贾晓玲.图书馆事业是PIR&CM的主导性社会组织机制[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09(1):1-4.
- [7] 丁力,张欣毅.“文化共享工程”在宁夏:背景、架构与可持续发展[J].图书馆杂志,2008(2):29-34.
- [8] 孟广均,徐引篪.国外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进展[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9.
- [9] 郭海明.信息共享空间下的图书馆服务共享空间构建[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10(12):1-4.
- [10] 王子舟.公共知识空间与图书馆[J].中国图书馆学报,2006(4):10-16.
- [11] 张欣毅.触摸那只无形的巨手——基于公共信息资源及其认知机制的认识论(下)[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03(2):6-9.
- [12] 中国图书馆学会,国家图书馆.基层图书馆馆长培训参考资料,2009.
- [13] 吴慰慈,董焱.图书馆学概论[M].修订二版.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7.
- [14] 周庆山.文献传播学[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
- [15] 蔡武.扎实推进公益性文化设施免费开放工作努力开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新局面[N].中国文化报,2011-02-25(1).
- [16] 蒋永福.政府与公共图书馆——关于图书馆制度的一种规范分析[J].中国图书馆学报,2006(4):17-21,33.

张欣毅 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常委,宁夏图书馆常务副馆长、研究馆员,《图书馆理论与实践》主编。通讯地址:宁夏银川市金凤区人民广场东街8号。邮编:750011。

(收稿日期:2011-03-23)